

走向新世紀的對話

—關於東西方文化資源和現代化模式的討論

■ 林思齊 加拿大卑詩省前省督

■ 杜維明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

□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

世界表面的平和與隱伏的衝突

□ 梁：回顧即將過去的一百年，是中國和人類歷經巨變的年代。各種主義、文化、思潮紛紛興起，隨著又衰微；各種大規模的衝突爆發，而後又隨歷史流水而逝去；一個一個理想如夢幻滅，一個一個新方向和視野又是出來。我們對二十世紀所形成的歷史共業需

要有沉痛的反思，也須在冷戰後的表面和平中，思考各種的變數。人的暴戾和罪惡似乎不會因冷戰結束而減少，反而在非洲、巴爾幹半島、中東、南亞各地均有可怕的流血衝突。在西方、東方各地，也有種族或階級對立之內憂，均令人須全面反省。究竟人類在下一世紀是否會重蹈覆轍，還是能學會從上帝的眼界看世界，尊重不同的人與文化之尊嚴，和諧和平地相處，以寬恕和仁愛來相待呢？我們描繪的新的世紀藍圖，顏色可能不僅僅是藍色、綠色的。至少，在目前來說，各方面對文化的認同和存在著的分歧能否有溝通呢？

■ 杜：東方和西方在文化背景、價值倫理方面的對立，可能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想，各種爆發對抗的潛在因素，都不能過低地估計。由於文化資源和

價值取向的不同，顯然導致了近年來關於文明衝突的一系列爭論。東方和西方都加入了這場爭論。例如，

新加坡和美國之間分歧就比較大，李光耀對美國作了不少批判。西方的媒體作出了強烈回應。他們雖然對亞洲其他國家也有批評，問題並不大，但對新加坡則有一種特別的羨憎之情。因為新加坡作為一個充分西化而且用英文為主流媒體的社會，為了維持經濟和政治的穩定，發展出一套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論，也就是說事實

證明和西歐及北美不同的現代性，不僅可能而且有現實意義。西方媒體對此是作了相當多的批評。

西方文化有無自覺向東方學習？

■ 林：但是，西方社會是不是知道，他們本身的文化資源、倫理價值正在面臨愈來愈多的危機呢？在西方文化的理想似乎陷溺於世俗的個人主義，人人在受西式自由主義教育的時候，都被教導須以自己的決定為本，不必理會家庭、父母或道德的觀點。這好處在發揮了下一代的個性和創造力，但另一方面卻培養了一大批不顧整體價值和整體責任的個人，每一個人人都變成孤離散漫的個體，不必與整體相關，也不須有普遍的價值和理想。這造成了與社會關係鬆散，其後就是你有你，我有我，家庭開

編者按：此文發表於1997年《文化中國》第1期，身處北美的三位華裔思想家圍繞當時熱議的「文明的衝突」的話題，以「文明對話」作為回應。再次刊發此文為的是回顧歷史、展望未來，在整個世界已經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今天，東西方之間唯有深度交融、相互依存，這個世界才會有真正的安全。



始不穩固，人與人之間有極多的衝突，人們沒有了起碼的安全感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們還認為在文化方面，自己始終是 teacher，天生是教育別人的。他們是不是理解到西方文化也要從其他地方吸收一些養分呢？

■杜：他們當然理解到這個問題。但他們認為在外面學不到甚麼東西，外面的困難反而比自己更大。不久前，我去日本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，有的學者就提出，美國應該從施教文明 (teaching civilization) 變作學習文明 (learning civilization)，因為東亞的知識分子近一百多年來，很虔誠地向西方學習，先是荷蘭、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，最後是美國，學了一百多年後，東亞知識分子有個自覺：除了向西方學習以外，有沒有其他新的資源，例如亞洲國家本身的資源可供利用？

■林：提到這個問題，我就想起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。一百多年前，是外國的傳教士到中國傳教，但現在卻變了，是中國的傳教士跑到北美來傳教，中國人的教會大大增長，甚至買下很多聚會人數大減的西方大教堂。目前華人對基督教精神的理解、發揚及對靈性的追求，似乎比西方人更有誠意和成果。其實華人教會鞏固了華人家庭倫理的關係，也與中華文化的倫理有很多自然的融合，在世俗化的個人主義大流下，維持了非常好的人倫與道德價值，西方人也應該向中國來的教會學習，他們有這種心願。但是，政府和學者並沒有任何回應。

對文化盲點的批判

□梁：我曾在西方一所神學為本的研究院作中國研究工作，其間很大的失望，是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從一開始就不放在議程，對中國文化與人類的交往也毫無興趣。他們有一個中國研究部，因為看到華人經濟實力雄厚，可以資助其機構，於是聘用一些華人，辦些活動，甚至在中國大陸請些學者來，出發點不是對中國文化有情懷或者承擔，而是想讓華人捐錢而已，我發覺那些西方學者都有些奇特的傲慢，從來不覺得有需要向中國文化學什麼。在他們不自覺的潛意識裡，他們自己是最高的，中國文化是第三世界的文化，與非洲和南美洲一樣，可供賞玩，而非學習。所以今日

中國文化界以為西方人要轉回頭學中國文化，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，或說中西文化互相學習，都是一廂情願。人家從沒這樣考慮過，人家仍是比我們強。要西方人了解自己的限制，是須在西方的華人親身經歷其社會的問題後，一針見血地提出對其文化盲點的批判，一方面善用其現代化的邏輯和理性方法與其角力，一方面提出超越現代之路。西方文化今日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有很多爭論，理奧泰 (Jean-Francois Lyotard, 1924 ~ 1998) 從後期維根斯坦思想發展出所謂後現代多元化處境之說，哈伯瑪斯 (Jürgen Habermas) 反對之，以為這只是現代未完成使命。我們從亞洲角度看，根本不必跟著這些思潮走，而可提出現後現代之外的上帝眼界，或易學太極的整全思想，以及生生不息創造性本體的世界觀。

中國學界仍是跟西方走

■杜：走出亞洲本身的思潮，在西方以外，自是一理想，然而現在的情況是這樣，在東亞的民間社會，包括一般的企業、教育、宗教團體，有很大動力和資源。但是，學術界，特別是學術精英，基本的心態還是西化的心態，即五四以來科學主義的心態。這種心態對於宗教問題，對於民間社會的很多動力，乃至如何與西方社會溝通，並沒有起很大作用。所以，現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例如，六十年代印度有一些大師大德來了以後，美國很多年輕人都曾受他們影響，韓國的基督徒在美國的民間社會也有很大影響。但相對來說，文化中國在這方面的影響還是很薄弱的。我認為主要的原因，代表文化中國的學術界（包括散佈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）的心態，基本上還是一種啟蒙的心態 (enlightenment mentality)，幾個基本的價值，譬如理性主義，是經驗主義、現實主義、進步主義和物質主義，相信人可以征服自然，很強烈的人類中心主義，突出社會工程論，無法擺脫西方中心說。現在看一下中國學術界的領導，幾乎是清一色的理工人才，理性主義色彩很濃，強調進步、繁榮、發展。至於精神文明，究竟其內容是甚麼，如何發展、投資，進行遠程規劃？還有人文學，也就是中國傳統的文、史、哲，包括語言學、歷史、宗教、文學、哲學，這些都被

邊緣化了。現在這個情況很普遍，台灣、香港、大陸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乃至美國的華人社會。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，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，華裔學生增加很多，目前亞裔高達百分之四十，華裔在其中的比例最高，但絕大多數是在學理工和企業管理。柏克萊雖有深厚的人文學傳統，現在卻受到很大干擾，不能發展，因為學生的興趣不在此，且經費來源有限。

■林：所以我每次去中國，有機會就跟學術界交流。他們都要求現代化，但很多人認為，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賺錢，如何在一夜之間發財。人文學科在中國不受重視，這是使人擔憂的一個現象。其實以我在西方發展企業的經驗，我是一方面遵循西方的理性化規律，但另一方面卻非常重視中國傳統的智慧，因時制宜，進退有度，心中不存要發達的執著，放開心懷，去享受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相交，以建立情誼為本，也去學習欣賞不同之人的長處，吸納不同人的智慧，去滋潤自己的生命。同時維持內心對上帝的敬虔和信心，以清心去見神，也以清心來對人。如此我的內心很喜樂，發財與否並不重要。但奇怪得很，當我不抱發財之心時卻又在事業上十分成功，主要在有了人的價值，有了親和的關係，有了信心，就能成事。發達是必須要一種屬乎靈性的智慧才能成功的。

義利與富強

□梁：中國自古有義利之辨，反對見利忘義，卻強調義以生，利正義原則自然也可產生有利的後果。這是人間之情際關係所開顯的特質。西方現代化卻是否定情際關係的，將一切放入客觀理性的程序中，以合理性的手段，達至謀利之目的，此中只要不違法便可以，從來沒想過義的問題，認為合法地不義是可以的，如出賣老朋友以得利，只要不違法就可以。而中國倫理卻要義利兼顧，結果不出賣人，反得到更多人支持和幫助，結果義以生利，仁者無敵，其利更大。若配合道家的放得下之智慧，以無為應世，放下財富的執迷，後果往往如耶穌所說的，在後的必能在前，放下的才得充實，有靈性智慧的人，才有更永久的成就。目前中國經濟發展，看來必須注意智慧之學，不能單講富強，富強同時也須有精神文化的深度。

■杜：很早以前，嚴復就有一感覺。他翻譯《原富》、《群學肄言》、《法意》和《論自由》等書時，雖然對西方法治、民主、自由和人權都有所關注，但有點最深刻，一個是富，一個是強。所以，中國一直在追求富強。日本有一個值得對比的現象，就是福澤諭吉那個時候提出的脫亞入歐，也是因為希望日本能夠富強。最近我和中國大陸一位中年的官員談話，他說，我們很難改變傳統一辭的負面形象，因為傳統象徵貧弱，一講到傳統，我們就聯想到貧困、柔弱，反過來，現代化就是富和強，而包括儒家學說在內的傳統，要麼是封建的，要麼是落伍的。

■林：因此，我認為，中國有可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，把以前不好的東西拋棄後，包括拋棄善良價值的意識，又把人的價值僅僅看成物質的，簡單到像機器折舊成本一樣使用。人變成社會的工具，經濟的工具，人自身就只有工具性，而無自我實現的目的性。這種人文學的斷層，價值的斷層，我們要充分予以關注，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不能輕易放棄和否定。由此，我也想到，現在都在講亞洲人的亞洲，但是亞洲定義究竟是什麼？是地理的觀念，還是價值倫理的定義？澳洲也一天到晚說自己是亞洲人，但他們的思想究竟是不是亞洲的？日本當然算亞洲，但已變了。特別是福澤諭吉，提出脫亞入歐，根本就否定亞洲的價值，認為亞洲代表了落後，那麼，亞洲的價值是什麼呢？近期亞洲的興起，有沒有亞洲的特性呢？

■杜：日本的路向就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。日本有一個文學家夏目漱石，也是二十年代的人物，他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，認為，他們日本人假如把力量完全集中起來，要想脫亞入歐完全可以，他們要富、要強，他們有幹勁，當然可以成功，但是代價太高，這個代價就是意味著靈魂會喪失掉，可能會有一種精神的大崩潰。

□梁：中國近代也曾有脫亞入歐的類似主張，就是全盤西化，或胡適所謂的充分現代化。但真正現代化的最深精神就是理性化，以及公共領域中的對話精神。西方現代化同時有一產品，就是否定神聖世界，中立化一切精神和道德，劃平一切價值，把人簡化為物質的所謂「世俗化」的過程。而當前中國對現代化的吸收，好像只有世俗



化的一面，這一面全都吸收了，一切向錢看，不守法紀，驕奢淫逸的風習全都出來了，但理性化的精神和對話的精神卻很少發展。也就是說，不好的都有了，而最好的卻沒有。另外，我也想到，在這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種稱為 *easternization* 的現代化，而不是 *westernization*，我們要有東方價值下的現代發展，這當然不是說東方文化全都了不起，而是說在現代化吸納西方文化的過程中，同時回顧省思東方文化的一些優秀價值，以之配合現代化發展，化解世俗化及個人主義帶來的不良後果，使現代化的過程不致引起世俗化的剷平性思想，把一切精神價值削除。

■杜：中國歷來有十年河東、十年河西之說，照這一觀點說，現代化是西方的價值觀，即以此啟蒙心態作為標準衡量世界各個不同的地區。不管是亞洲、非洲、拉美，或者伊斯蘭教地區，現代化都是指向這一方向，就是梁燕城剛才講的 *westernization*。而 *easternization* 如果是指東亞的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模式，那麼，這個現代化的模式應該跟西方有密切的聯繫，而又跟西方不盡相同。至少，在社會、政治穩定發展，乃至改善人際關係、減少貧富差距方面，這個地區都要比西歐、美國等國做得好。所以，今天是不是有新的趨同 (*convergence*)，就像剛才講過的 *easternization*，以前的亞洲社會都要向西方的現代化趨同，現在西方也有向亞洲趨同的必要。但我認為這兩者是在同一個標準之上，以前是你們富、強，現在我們比你更富、更強，所以，要向我們看齊。現在我考慮除了這兩個模式以外，有沒有另外一種新的模式？我有這樣的一個構想，假如有儒家式的現代文明（或者用儒家式的現代文明來表明東亞），並不是說東亞、南亞、乃至拉美，現在的東歐、美國，都要向這個模式認同。這裡的意思也就是說，以前認為只有一種模式，就是西歐、美國那個模式，而現在那個模式已不可能完全普世化，因為美國模式並不能輸出，東亞有他自己的模式，而這個模式必然和以前西方的模式有密切關係。東亞知識分子一百多年來向西方學習，不是白學的，學了就要做。過去僅僅一個模式的思考即一元模式的思維出現了問題，現在出現了第二個模式，打破了一元模式思維，但並不是具體打破了第一個模式，更不是說現在必須向

東亞模式看齊。所以，東南亞可能有東南亞的模式，南亞可能有南亞的模式，而東亞的模式與東南亞的模式絕對不盡相同，而且很可能會大不相同，即使印度尼西亞、馬來西亞的模式，同東亞的模式有密切聯繫，但又有明顯不同。事實上，南亞這個地區發展以後，又會跟東南亞不同。至於談到拉美，現在看來，以前彼得·柏格 (Peter Berger) 就碰到了這一難題。他一開始認為有東亞模式，但做了很多研究以後，他又否定了這種模式。原因是這個東亞模式不能輸出，例如像拉美這樣的地區就不會接受儒家文化。這其實是過分強調東亞模式的結果。以西方為唯一模式的觀念打破以後，並不意味著要以東亞的模式取代西方，而是意識到在西方模式之外還有其他的模式存在，也就是說，將來東亞、南亞、非洲、拉美都可能出現自己的模式。另外，現代化的主流模式的本身會發生分化，任何其他的模式也會發生分化，這種分化的本身可以是非常健康的多元景象的。在整個東亞模式中，中國和日本的模式不一樣，和韓國的也不一樣，但在分化中，作為現代化的一些基本功能，比如說理性主義，不會因為分化失去作用。但是如何發生作用，在各個不同的地區、不同的模式中是不一樣的。除了理性主義之外，還有其他價值也許比理性主義更重要，例如同情的、慈悲的、博愛的價值，如果以前認為沒有關係，現在對這些價值應該重新評價了。

東亞的成果不一定是儒家文明

□梁：杜教授剛才說的，顯示了一種全球化的多元的現代化觀念。我比較感興趣的是，為什麼東亞一定是屬於儒家的？在這裡有一大弔詭，就一個社會興起，有其宗教精神及倫理背景。這是韋伯的分析方法。韋伯指出西歐和北美的興起，是來自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倫理。但韋伯又分析中國宗教如儒家思想，因有濃厚迷信的巫術花園，也有官僚階層，很難發展理性化的現代精神。如今提倡儒家與東亞文明關係的人，一面接受韋伯的方法，才可證成儒家與經濟的關係，但另一面又大肆批判韋伯對中國宗教的分析，形成既推崇韋伯又反對韋伯的現象。其實我覺得韋伯對中國的分析也不無洞察。而近數十年東亞文明的成功也

可被解釋為摒棄儒家，走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成果，而且這些地區的文化，也不單是儒家的，也有很多其他精神因素，如佛、道家等。而更有趣的，有什麼歷史學者尋索早期香港商界領袖的背景，竟大部分是基督徒，那是否仍是新教倫理呢？其中儒家因素有多少呢？

■杜：為什麼二三十年來一直有這個問題，是值得注意的。經濟學家從經濟發展的規律，從市場經濟的角度，多半認為非經濟因素要排除，不予考慮，如果要考慮進去，你這個經濟學家的解釋就有了限制，不再扮演經濟學家的角色，提出問題可能是經濟的問題、制度的問題。這樣，很多制度學者開始說，除了考慮經濟原因，還要考慮政治原因、制度原因，有些人認為還應該考慮文化的因素。文化的因素不是排除了經濟的、政治的原因，而是 value-added，就是先從經濟領域來解釋，或者從地緣政治等其他各種不同領域來解釋。這種解釋不夠全面，才把制度因素、政治因素擺進來，如果還不夠，才把文化的因素提出來。

新教與儒學對經濟的影響

■林：這個 value-added，是否也包括宗教？

■杜：是。以前韋伯講的新教倫理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複雜關係，就已經提出來了。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時，在整個東亞，哪一種文化因素是東亞有的而其他地方沒有的？這是需要考慮的，不能說東亞僅有一種文化，其實東亞文化豐富得很，但是有什麼因素使這個地區有特殊性，而其他地方沒有？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才提出儒家倫理的問題。例如以大乘佛教為例，除了東亞以外，東南亞，南亞，還有西藏，也都是大乘佛教，範圍很大。如果再考慮其他文化因素，包括基督教，在這個地方起到很大作用，但問題是基督教等也在拉美起作用。這樣比較後，就會提出一個問題，這個地區因為政治不同、制度不同，有沒有一個比較共同的價值取向，其中包括人際關係，家庭的關係，個人、社會、政治乃至經濟行為背後所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，才提出了儒家倫理的問題。因為大家發現，這個地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，是屬於儒教文化圈，而這一價值取向是其他地區沒有的現象。

■梁：這種分析大概有兩個問題，一是儒家的範圍，最主要區域應該是中國大陸，但中國大陸卻反而有很長一段不增長的時期，近期又突飛猛進，這兩時期的成敗，因摒棄儒家，還是因有儒家才如此呢？這始終仍有爭論。另一是從基督教的影響來說，當時香港商界領袖大多是信基督新教，而與韋伯的新教倫理是一致的，不過這些基督徒商人做事的方式也有儒商味，故也可以說是儒學與新教融合產生的一些新文化特質。至於拉丁美洲是信羅馬天主教，雖是基督宗教之中，但卻與新教有不同文化型態。此外菲律賓也與拉丁美洲文化接近，同樣發展不起來。

■林：在這裡還要提到菲律賓。這個國家受美國、西班牙影響很深，也最早嘗試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。但為什麼菲律賓方式往往在亞洲行不通，反而出現了一系列問題？

後現代的特殊性、普遍性及人性問題

■杜：我在台灣長大。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出國就到馬尼拉，我代表童子軍到那兒開露營大會。馬尼拉在五十年代是亞洲最繁榮、最富裕的社會，菲律賓是亞洲發展的典範。從東京、漢城到馬尼拉，當時台北還是以三輪車為主要交通工具，沒有計程車，香港那時也很落伍，菲律賓發展很快，完全是美國文化的翻版。但到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，菲律賓沒有進一步發展。還有一個巴西也值得注意，巴西曾被列入十個發達國家之一，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，卻發現是泡沫經濟。所以，現在有一些經濟學家，比如史丹福大學的庫格門（Paul Krugman）教授（最近移教麻省理工學院），一直在認為，整個東亞，包括日本的發展，僅僅是一個不健康的過渡。不過我想現在已經過渡了二三十年，應該可以判斷為和西方不盡相同的發展模式，不能認為發展只有一個模式，也就是西方模式。當然，根據西方目前在文化研究領域裡大行其道的後現代主義，不僅僅是各個地區有特殊性，任何相同性、普遍性都很難一成不變。但普遍性的概念究竟是什麼，是東方的文明，還是西方的文明？

■林：這種普遍性裡包含很多內容，但至少在人性的善和惡方面，是大家都面臨的共同性的問題。



這就又離不開宗教問題。剛才我曾談到基督教的問題。我曾對西方人說，如果語言沒有障礙，現在應該是中國人向你們傳福音了。我出生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，祖父當年是中國內地的一個牧師，所以，我一直認為在溝通中西文化，乃至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，宗教情懷可以起橋樑作用。但是，目前由於享樂主義在西方盛行，宗教情懷也日益淡薄。《文化中國》創刊的時候，我曾經在接受採訪中談到，希望在西方目前這個社會裡，人們生活庸碌，不妨夜闌人靜的時候，看滿天星空，感受自己的渺小，而尋找人生的真正成功。文化的重建在於對人價值的重新認識。成功的價值不應是金錢和其他物質。或者，說不是物化的。剛才我們提到，菲律賓、巴西富裕的時候，往往也是人心最腐敗的時候。現在中國的大陸，會不會也演變出同樣的問題，因著貧富懸殊與官僚貪污，堵住了發展，重蹈第三世界發展的覆轍呢？

對付貪污的必要及各國貧富懸殊危機

□梁：正本清源之道，是發展一種廉潔文化與商人倫理，從中西精神資源中梳理出一種廉潔精神和人格來。這方面為儒家精神十分重視，義利之辨始終須一平衡，人格與利益必須互相激發，才能形成長遠的經濟成長，這是宏觀的經濟眼光，不限於實利。只有實利，而又見利忘義，則經濟發展很快就陷入貪污制度化的問題。而後果就變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例子，一時的成長產生了腐敗。

■杜：第三世界發展出一時的富裕，是一種非常不公平的情況下出來的，也就是說，在貴族文化的宰制下，只有少數人富裕，但沒有像東亞那種模式落實下來。這裡可以提到的一個觀點，即所謂反庫茲尼斯效應(anti-kuznets' effect)。一般來說，經濟學家有個定論，就是說經濟發展越快，財富積累迅速，一定會造成社會極大的不平衡。而和這一現象相反的理念，是根據台灣的經驗提出來的，認為經濟雖然發展了，但並沒有出現經濟學家的那種定論，社會反而在財富的平均分配方面沒有出現嚴重的差距(近年來情況卻大有惡化趨勢)。也可以舉日本的例子。日本企業裡的領袖和工人的薪水，六十年代是十比一，現在是六比一；美國以前是三十比一，現在是一百比一。美國的情況令人擔憂。美國的經濟

目前正在復甦，但復甦以後，巨富雖然增多使得中產階級確有生活水平愈來愈難維持的憂慮。更可怕的是最貧窮的百分之十還有收入下降趨勢。洛杉磯在這方面最典型。在過去五年內，洛杉磯的暴發戶有所增長，但最貧窮的人，除去通貨膨脹原因外，實際收入大幅減少。這種貧富不均的尖銳對立，可能會造成暴力衝突。這裡還要提到菲律賓。我第一次去的時候，有很深感觸。華人很愛國，他們也有錢，但是又與菲律賓的政治有很密切的結合，任何競選多是華人的資金。因為部分華人擁有很大的財富，不時表現出一種暴發戶的心態，例如華人的公墓也建造得非常豪華，甚至有些公墓比旅店還舒服，可以住人、吃飯、玩麻將，而墓外面就是很多貧困無依的當地人。他們看到死人比活人生活要好多少倍，情緒非常激烈。結果，六十年代開始的排華，一開始都在唐人街，但那裡主要是中小企業、零售商店，受到很大打擊，所以有錢的華人變成既得利益，發展得很好，造成了菲律賓的繁榮，倒霉的是無依無盡、白手起家的華人。這種反華情結，到後來就變成零售商的菲化案，所有的零售商都要菲律賓化，華人零售商的權利被徹底打跨。當然，這也產生了一個奇怪的過渡，華人企業家只有兩種選擇，一是轉業，二是國際化，一些人正因為國際化以後，企業更加大型化了。

馬來西亞的成功例子

□梁：我最近在馬來西亞，也發覺有相似情況。當時政府要華人將經濟成果與馬來人分擔，初時華人很不滿，但後果卻很好，不少馬來人分到利益，與華人共同富裕起來，就少了種族的矛盾。而大馬的華人也很有捐助，對社會有很多貢獻，減少了社會貧富差距，使馬來西亞人認為有一種公平，消解了排華的因素。而現在更有趣的是，馬哈迪爾訪中國，說馬來西亞原來是同中國一家人，也自然要善待其他族裔的宗教。所以大馬華人的中華文化，特別是儒家之情懷很深，而華人基督教會也很興盛，大家又有同心建設大馬，走向2020年成為先進國的宏願。大家都抱己欲立而立人的原則，種族與文化就在發展中得到互惠互利的和諧，不再有六十年代的衝突了。

■林：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政策。據我所知，

馬來西亞有一個比較好的作法，就是在馬哈迪爾下面有一個班子，有華人，有馬來西亞人，每星期召開一次會議，了解和掌握各地可能有什麼磨擦，然後馬上進行解決。這種讓各族不斷對話的設計，在世界各地均應提倡。

■杜：我認為這種方法好在儲蓄社會資本，不是 economic capital，而是 social capital。有人研究，印度有一個叫拉克勞 (Lochnow) 的地方，很長時間裡沒有發生動亂，而拉克勞的附近和其他地方都有衝突，特別是印度教和回教的衝突很厲害，但拉克勞沒有。其實，這個地方的社會結構、人種分佈、經濟發展等背景和其他地方差別不大，但他們有一個特別的傳統，就是對話和溝通，專門有一個組織，回教的和印度教的，每個星期各自的領袖、知識分子在一起會談，看有沒有什麼情況出現，如果有謠言，就立即消掉，如有衝突，就馬上化解。其他區沒有對話，謠言愈來愈大，沒有溝通，就變成衝突。

外國人對世界華商會的疑慮

■林：我最近和一個外國朋友說，我要提倡 dialogue，這也是梁燕城近年來極力提倡的。他組織各國學者來加拿大對話，我一直表示支持。1996年5月，我去華盛頓開會，克林頓總統也來了，他們非常願意聽我談二十一世紀中西和諧的問題。我每兩年要參加一次華商年會，上次在香港時，日本和其他國家傳媒訪問我。我發現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問題：你們在世界搞華人商會，是不是要建立華人的第三力量？也就是說，海外華人是不是要把經濟方面的力量聯合起來，成為一種對世界政治發展的一種回應。我明白地指出，這裡面沒有政治目的。

■杜：這種心態十分有問題。因為長期以來，有人總覺得華商之間有特殊的聯繫，從印度尼西亞，到馬來西亞，到香港、新加坡，乃至大陸，打幾個電話就可以一下子集資千百萬。另外，這種心態也反映了一種摸不透的感覺，就是認為看不清楚，裡面有太多刻意經營的詭計。講得輕鬆一點，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但事實上並不如此輕鬆，因為背後有太多太深的不正常心理。問題在於，這種不正常的心理狀態，更因為華人社會自己各種表現而火上加油。這種油如何加的？例如，現在華人企業缺少文

化上的反思，這是最危險的，因為其背後的資源太薄弱。如果你是一個精英，又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、佛教徒，那問題不大。但事實上多半不一定。

海外華人的文化與道德

■杜：現在大家就怕這個。但為什麼使別人怕？一些有錢的華人，到了溫哥華、多倫多，到了舊金山、紐約，到了澳洲、新西蘭，等於是到了一個受法律保護個人權益的自由世界，尋到了一個可以自由發洩已經積壓很久的、最壞的私欲的機會。在香港蓋不成二十層高的宮堡，但到了自由世界，甚麼都可以幹，而且認為這些國家注重個人主義，當然要拼命發展，結果是極端的個人表現。這種心態也反映到學術界，即使在一些大學講學的中國學者也在所難免，一些事情令人無法理解。我們許多人都有憤憤不平的火氣在內。總而言之，在一大批精英（包括文化的、經濟的）背後的精神資源，實在太薄弱了。

■林：華人自大的心態是應該引起注意的。我經常回香港，跟上層人士來往較多。但發現每年談話的內容都有變化。以前，我回去香港，他們非常有興趣地向我打聽美國如何、加拿大如何、其他國家如何，顯示了一種急欲了解外部世界的謙遜。但現在似乎對外部世界不感興趣了，認為自己是老大。這樣，溝通就難了。三十年前，我剛到加拿大加西部，去見一個大銀行家。他一看見我說：「啊！你是香港來的，我對亞洲很有興趣啊！我有很多朋友也是亞洲人啊！」但也僅僅如此而已，不能再深入地談下去。因為他根本沒有去過亞洲，也不認識亞洲。我後來就有一個印象，簡單地結識朋友很容易，但真正要達到溝通，必須對不同的文化有一定深度的了解。

後現代的溝通問題

□梁：這些情況都說明，後現代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溝通愈來愈不容易。表面上是溝通的工具愈來愈進步，但人們之間的真正溝通反而是愈來愈難。電腦的國際網絡使人好像有了會通，但事實上面對面的情際交往，人與人心靈的相遇和理解卻愈來愈少，反而使人愈來愈自我中心。溝通的阻斷是造成衝突的一個原因。例如，當今世



界上大部分的民族、種族衝突，很難說與缺少溝通沒有關係。每一個衝突完結了之後，另一個衝突就來了，所有的對話都無法進行。這是人類目前最嚴重的課題。

■林：我們應該問一下，是不是要等到人類完全毀滅的時候能覺醒？是不是到那個時候才可以對話？

■杜：那太危險了。因為這個破壞是沒有止境的。波斯尼亞是一個情況，貝魯特也是一個。貝魯特以前是中東最文明、最美好的城市。波斯尼亞也一樣，是世界民族和諧的代表。但是，正如水井遭污染一樣，要讓它再清晰是很難的。不能造成一種預先的破壞。就像台灣一樣，如果內部不健康的族群意識變為一種抗衡的行為，而不能化解，到了一個爆發點，將來不可收拾。從這個意義上，我們提出文化中國這個概念，好處是大家都贊成溝通，再怎麼不好，大家一起吃個飯、見個面，會通的渠道還是存在著。如果這個渠道斷了，那就很危險。

大家都說「不」的不健康情緒

□梁：但現在中國有一種動態，就提倡說不。

■杜：日本提出說不，有一些具體的、歷史的原因。中國現在提出說不，則有一種不健康的情緒。

□梁：問題是，人家也說不，美國也說不；東方說不，西方也說不，我們中國對西方說不已百多年，如今才有點兒走上現代化的理想，又來鼓吹說不，是違反人類互相溝通對話之方向，後果就只能是衝突和對抗。這種偏狹的民族主義恐怕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非常不利，使那些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者振振有詞。民族文化自信是必須的，但仍是要以謙和的心來面對全球的發展，強調中國是以和諧與溝通的心進入世界。

■杜：我想起林博士剛才提到的世界華商大會。第一次會議在新加坡，有兩個議題，一個是華商之間的溝通，另一個是文化認同。後來到了香港，文化的討論就減少了，而到了曼谷開會時好像已經沒有甚麼文化議題，完全成為一種商業上如何合作、聯繫的會議。所以，我覺得有必要強調文化認同的重要性。文化的問題不但要談，而且要讓它透明。我在

日本演講，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，語言不同，但媒體知道我在講什麼。台灣現在的情況，似乎民主的惡質化很厲害，但媒體的力量很大。媒體有很糟的一面，但卻使現在台灣的政治很黑箱作業，要做什麼大家都知道。這樣的好處是能建立起一種公信力。這種透明，也促成了一批公眾知識分子 (public intellectual) 的出現。不久前洛克菲拉基金會曾舉行一個討論美國人文學危機的會議。我在會上談了一個問題，以前是學術界培養知識分子，但學術界過度專業化，這是現代化的一個明顯標誌。由於過度的專業化，學術界的學人主動自覺地不願意扮演公眾知識分子的角色，因為扮演這個角色會干擾專業的學術研究，損失太大。但是公眾知識分子這種角色，面對二十一世紀卻是更重要的。假如大家都是專業的，都只知道顧個人的專業，那麼誰來公眾的利益呢？不能單靠政府和教會吧？所以，現在一些公眾知識分子，不但在學術界，也在媒體傳達他們聲音。美國目前媒體的知識分子強調「公共報紙」(public press) 的重要性，本來報章必然含有公共的意義，但後來很多報章已私有化了，變成私人利益的代言人，沒有公眾的角色。公眾知識分子現在也出現在政府、企業、民間團體和各項社會運動中，如婦女運動、環保、消費者權益、為無依無靠、受歧視的人發言。這麼多聲音同時並出以後，局面跟以前就大不一樣。假如設想，世界商會可以成為文化中國發表意見的一個論壇，那麼，不但有助於企業溝通，而且也有助於世界各國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，使所為的中國威脅論失去理據。

化解衝突和仇恨

□梁：1996年世界信義宗聯盟在曼谷舉行儒學和基督教討論會的時候，我發表看法說，基督教和回教的對話，過去是很不容易的。過去歷史有太多衝突，誤會和仇恨很深，但儒家卻可以成為中間的橋樑，有可能使基督教和回教形成會面，因為儒家以仁為本，而基督教和回教也講仁，儒家居於中間，可以使他們千年仇恨化解。

■杜：不但需要化解宗教情結，而且也要化解民族情結。第一次華商會議的時候，八百多華商參加，有一個很有趣的事。舉行會議的新加坡是一個

英語為主的國家。田長霖代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去，本想用中文但卻開玩笑說身為美國大學校長，英文帶著濃厚的鄉音，因此從不放棄用英文演講的機會，結果在那次會議上還是用英文發言。我事先接到的通知，論文也要用英文發表，但在發言前夕，主持者卻提出，因雙語為大會政策，而在我之前的發言為英語，所以要求我無論如何用中文發言。結果，在這次本應是雙語的會議上，我成了唯一用中文發言的人，引起很大的反響。所以，我個人對化解民族情結有很大感觸。那時，華商來自許多地方，在非洲、歐洲受了很多歧視，都想出一口氣。這個情結非常強烈，但不一定正常，要注意化解。但文化認同卻又不能迴避，兩者要平衡很難，但一定要面對。海外的中文報紙已經國際化了，但卻與主流地區有很大差別。中英文報紙對各種新聞通訊社，但實際上消息的渠道被五家通訊社主導。這五家通訊社渠道後面的意識形態是非常明顯的，純屬歐洲中心主義，要參與其中非常困難。但是慢慢地可以讓他們接受多元化，讓他們了解中國人在幹甚麼？這裡，坦率和公開化很重要，不能用中文講一套，用英文講另一套，或者在美國講一套，到台灣講另一套，跑到中國大陸又換一套，三個地方三套講法。民間的動力很大，企業的動力很大，媒體也有他的動力，各種社會運動也有它的動力。但是，知識界的精英應該發出最健康的聲音。我們並不指望會有多大影響，但是起碼要有文化意義。雖有政治涵義，但卻不為任何阻塞權勢服務的宏觀公論，現在的問題是連向這方面努力的共識都很難形成。

建立公眾領域的必須性

□梁：所有關乎文化的價值，都牽涉最後的人性問題。中國文化認為人具普遍的善性，這看法可肯定人有尊貴的價值。但問題是人的善在實現時，總可以歪曲為罪惡，人可把一些美善的真理扭曲為迫害人的理由。愈高美善的真理，歪曲所產生的罪惡就愈大。如人追求生存是善的，但人為了生存而去掠奪他人的資源，就變成罪惡。不過要生存的善被歪曲，所產生的惡最多是傷害少數他人，其善不是最高層次的善，其產生的惡也較少。但較大的善，如愛國，當用愛國的理由去侵略他國，

這種歪曲所產生的惡就更大。當人信有真理有上帝，也本是善，但用真理和上帝去迫害人，則其惡更大。蘇格拉底和耶穌都是被這些高等善所產生的罪惡害死的。人可以用上帝的理由來毀滅上帝的工作。儒學也可以變成吃人的禮教。人總會把真理進行歪曲，而歷史也就這樣發展下去。這種罪惡，儒家怎樣去處理，達致與世界文化的和諧呢？

■林：很多殘酷的罪行都以愛為出發點，甚至打著宗教和文化思想的旗號。但這不是宗教和文化的失敗，而是有人把宗教或文化變為人的權力的工具。這是人的失敗。宗教或任何人生價值，不應建立在人為的模範上，把人變成偶像。在宗教價值來說，是人和上帝的感通關係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，對他人的不同，先要尊重他人，與他相和，而不可用真理名義去壓人，這才能形成和諧。儒家對罪惡的處理，可能要參考一下道家。中國人所說的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是很深的境界。所謂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」，當人的欲求「至於無」的境界，就能擺脫嗜愛、偏見、執著，而得釋放成為自由的人。進一步，《聖經》說「施比受更有福」，人不但無，求更能主動付出，那就將罪惡化解，扭回正直善良之道。這是一種信仰。信仰能超越罪惡之心，不再自我中心，也不用敵視眼光看人，卻以平安喜樂之心觀世界，這就成為一種精神的財富，是錢買不到的。

■杜：儒家文化下也曾有不少罪惡，如三綱五倫帶來的禮教。不過儒家也是毫不猶豫地批判這些錯誤的。中國如果只求民主富強，也會引發他人的懷疑，恐怕富強的善會歪曲為報復的惡。所以中國也須向世界提出一文化的和諧訊息，就是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及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這原則可防止善良的歪曲，永遠與他人為善，建立和諧。

抉擇要愛中國文化

□梁：歷史發展總會歪曲善，產生罪惡。在各種現實罪惡中人要起信，才能超越歷史的無奈。我們仍是信仰宇宙的本質是善，而為歷史留下一些美麗的種子，永遠以這信仰堅持奮鬥。現在我們提倡的文化中國理念，也許我們在生的時候並不一定能看到成果，但相信將來會有影響。比如孔子



在世時並沒有看見自己的成果，但是卻在歷史上留下偉大的道德價值和聖人典範，對萬世皆有教化作用。本來，我們在國外生活得很好，可以完全不理會中國的事情，我們一生也沒有從中國得過什麼好處或利益，但為什麼有這樣一種關懷呢？這是因為，中國的歷史產生了孔、孟、老、莊、岳飛、文天祥，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文化，而我們分享了這個歷史和文化，也共同承擔了這個歷史和文化中的苦難。然後，現在我們反哺這個文化，把我們在國外所體驗到最好的東西帶回去。中國這十幾年是發展最需要突破的時候，我們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作出了這種選擇，表明願意與其分擔痛苦。最近應邀去北京大學參加宗教系成立大會和學術研討會，我在會上發言中提到，基督教要中國化，可以提出很多理論和概念，但很重要的一點是，假如有一天基督徒能選擇與中國人共同渡過困難，並與他們分擔痛苦的時候，這時候就是基督教屬於中國宗教了，不再是外來的了。這是我們莊嚴的使命，抉擇要愛中國，愛它的大地、歷史、文化。

■杜：從不同的角度講，我們可以有選擇，但可以說也沒有選擇。對我來說，愛中國是沒有選擇的，因我已在它的歷史文化中。每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人，有很多結構上的限制是不能選擇的，如族群、性別、出生地、社化、語言、階級和與生俱來的性向之類等。有人認為，把這些消解掉了，人才能真正脫胎換骨。但我認為，這些限制本身可以成為充分自我發展的必要條件，可以變成一種資源。正是因為我們和中國文化有很深的感情，即使離開了那個地方，但中國文化的血液還是流在我們的身上。限制是指結構上的限制，而人的存在不是靜態的，卻是一種動態的發展，在每一步發展的過程中，所有限制和條件都可以轉化成自我發展的因素。這中間有很多曲折，既是層層限制，又有層層破除限定的可能和機會，可以培育的資源是無窮的。

無窮資源的形而上學問題

□梁：我也同意從另一角度看，愛中國是無選擇的。因先天上我們已是中國人，生在它的血緣和歷史文化中。如今在地理上不身處中國，或故

意忘記自己的根源，但仍可抉擇回到這不可選擇的身分與情懷中。不過你提到的無窮的資源，這涉及形而上學的一些問題。無窮的資源是不是一種天的意思，天人合一的意思？是本體論的，還是人文意義上的平面講的無窮可能？

■杜：不是啟蒙時代以後的那種人類中心主義。最大的不同，它同自然、天道是連在一起的。如果具體地說，個人與社群，包括人際關係，家庭、族群，以及更寬廣的各社會關係，整個人類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，然後是人心與天道。所謂個人／社群，人類／自然以及人心／天道四個有機整合的面向之間的三大關係。人類和自然，至少要有某種和諧，不然把自己的生存空間破壞了，結果是同歸於盡。這是一種人文精神，但這種人文精神不單是平面的，也有立體的。天人合一也許是人心與天道、人類與自然、個人與群體之間和背後一種更深刻的意義結構。

天道和內在的超越

□梁：你提到的天道這個名詞，是不是一種宇宙流化的實體跟人性同為一體的形而上學的天道，還是自然的物質性的規律？還有，天道是不是一種創造的動力？這涉及當代儒家常談的內在超越，應該如何理解內在的超越？是否只能從內在才能超越呢？

■杜：我認為不只一個向度。我不把天道解釋成自然。天不完全是自然。比如說人本性來自天命，我自己應該可以了解自己，但我們存在的這個天地，還要承認有些側面是自己永遠無法了解的。所以，這個天一定有一種神秘的層次，這一層次不是人的理智所能達到的。但如果不充其量地善於運用人的理性，也是不對的。內在的超越，並不是說一切從內在的體驗來展現，而是說可以經驗到、體驗到、理解到自家本有，但自家本有並不意味著你可以充分掌握更精緻的價值。它永遠是溢出理性所關注的。

儒家的宗教性和神學性

□梁：這神秘的層次，涉及一種高的境界，這沛然流出的價值，很少講你自己的哲學。但如今看你不單有哲學，且有點神學論點，像是西方的進程神學。這是不是有一種儒學的神學的韻味？

■杜：一些學者也提到過這種看法。我感覺到他們對我有一種同情的了解，而這種了解，有些是我自己想不到的。儒家的宗教性以及和神學（不僅基督教也包括和伊斯蘭教）對話問題的確值得探討。

儒學能否對科學作出回應？

□梁：這也涉及到儒學的超越性問題。現代科學所提出的一些問題，如宇宙大爆炸的理論，顯明宇宙有起源，儒學能不能作出回應？這是所謂乾稱父、坤稱母的問題。天地是父母，那麼天是否有恩情，他是否須有報恩上天之情呢？

■杜：事實上，我們從張載、邵雍和朱熹的思想中可以看出，儒家傳統對原始是怎麼來的，將來如何去，並不是漠不關心的，而是興趣濃厚的，但關鍵並不在此。比如說，王艮認為，如果人是化生，也就是從無機物、生物和動物演化而來，那麼天地是父母；如果人是形生，也就是父母生下來的，那麼父母為天地。因此對天地父母都要敬重都要有報恩之情。儒家傳統一直是認為，宇宙的生生大化的過程是無始無終的。所以，大爆炸理論的出現，對儒家理論並不一定產生很大的困惑。熊十力晚年也認為，生命力要在物質中爆發，而且也不否認在其他星球也有生命力的爆發。生命力能爆發出來，證明地球並不純粹是物質的，也就是說，不能接受物質的一元論的觀點。物質不管如何轉化，都不能轉化出生命。所以，最真實後面的東西並不純粹是物質的，必然有精神性的势能潛存其中，因此氣的哲學

不是西方意義的物質主義，而是有無限精神潛能或精神資源。

□梁：現在，我們已經注意到一個嚴重問題。對中國人來說，他自己看自己一個自足的很有文化和經濟成果的世界，但從外國看又是另一個不足的、有很多問題的世界。不但對中國，對許多民族來說，都面臨相同的問題。如今應是全球溝通的年代，但控制傳播的卻是西方中心觀點，很容易形成傳播的扭曲。哈伯瑪斯強調溝通行動及對話的理想處境，確有二十一世紀的遠見。但理想的溝通行動，必須先有一批懂得在公眾領域對話的知識分子。剛才我們提到的公眾知識分子 (public intellectual)，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。我在香港商業電台當時事評論員時，發覺已很少評論的平和性。後來到加拿大，卻發現不論在海內海外，華人的文化和學術圈子，充滿不少語言暴力，評論成為攻擊人的工具。這種語言的暴力，一方面出於中國文化本身沒有公眾領域（又稱公眾空間）和互相尊重的對話精神，另一方面也源於有些知識分子強烈的功利主義目的。不是從真才實學去討論問題，而是為了建立名氣，用痛罵一些有地位的知識分子來揚名，是一種極敗壞的文化現象。如何建立一個議論 (discourse) 的風尚和理則，是公眾領域的一個重要的方向。我們目前文化中國的路線，就是鼓勵議論風尚和建立公眾領域。以此為基礎，才能培養罵人的公眾知識分子，推動一種文化價值，為經濟發展立下精神文明的基礎。